作为儒家的杜甫 ——《杜甫诗选》导言

■莫砺锋 童 强

一

唐代是一个思想相当解放的时代,儒、道、佛三家思想都受到朝廷的重视和支持,思想界呈现百花齐放的繁纷局面。盛唐诗人的思想既复杂,又活跃,王维信佛,李白好道,皆为显例。杜甫则与众不同。杜甫在青年时代一度醉心于道教,对仙丹灵芝及长生仙界颇感兴趣,那只是世界观尚未确立时的浪漫幻想。杜甫壮年以后对佛教产生了好感,是由于频遭挫折心生苦闷,想从佛教得到一点慰藉,并非真想遁入空门。就其主要思想倾向而言,清人刘熙载《艺概》卷二中的论断非常准确:"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。"

杜甫出生在一个以儒学为传统的家庭里。他从小接受了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,终生服膺儒学。杜甫经常经常自称"儒生""老儒",甚至是"腐儒"。杜甫偶然也发发牢骚,说什么"纨袴不饿死,儒冠多误身"(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),甚至说:"儒术于我何有哉,孔丘盗跖俱尘埃!"(《醉时歌》)但那只是在极端悲愤的情境中的牢骚话而已。事实上杜甫对儒家思想的遵循已达到孔子所说的"造次必于是,颠沛必于是"(《论语·里仁》)的程度,终生不渝,死而后已。

儒家关注的对象是人生与社会,他们的人生态度必然是积极入世的。杜甫对于人生抱有坚定的信念,他把安邦定国视为自己的使命。青年时代的杜甫早已胸怀大志:"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!"但当时他对自己的人生道路还没有作深沉的思考,他的壮志还缺乏具体、确定的内涵。待到长安十年,杜甫一面体验着人生的艰辛,一面观察着人民的疾苦,终于确立了坚如磐石的人生信念。三十九岁那年,杜甫首次自述其志:"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。"(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)五年之后,杜甫再述其志:"许身一何愚,窃比稷与契!"(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)前者着眼于君主,后者关注的重点转到自身。写前一首诗的时候,杜甫还是一介布衣。写后一首诗的时候,杜甫刚刚得到一个从八品下的微职。然而他的口气是如此狂傲,他的志向是如此高远。

什么叫"致君尧舜上"?就是希望君主变得像尧、舜一样贤明。在帝制时代,实行仁政的首要条件是君主贤明,否则一切都是空谈。尧舜是儒家推崇的古代明君,是儒家用自己的政治观念塑造出来的理想人物。杜甫希望皇帝效法尧舜,其实质就是希望他们实行仁政。这是杜甫实现远大政治抱负的必要步骤。什么叫"窃比稷与契"?稷,又称后稷,是舜时的大臣,相传稷从小就善于稼穑,所以舜让他主管农业。契,是协助大禹治水的大臣。杜甫自比稷、契,是不是自许太高?对此,王嗣奭在《杜臆》中有非常好的解读:"人多疑自许稷、契之语,不知稷、契元无他奇,只是己饥己溺之念而已。""己饥己溺",语出《孟子·离娄下》:"禹思天下有溺者,由己溺之也。稷思天下有饥者,由己饥之也。"这是一种高度的责任感,一种伟大的胸怀,一种高尚的政治情操。然而稷也好,契也好,他们身居高位,本来就承担着国家的重任,他们有这样的责任感是理所当然的。杜甫则不同,他只是一介微臣,甚至只是一介布衣,按照"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"(《论语·泰伯》)的常理来说,杜甫本来是不必怀有此种责任感的。然而杜甫竟然自许稷、契,竟然以"己饥己溺之念"为人生目标,这是崇高、伟大的人生信念。

杜甫一生困窘,屡遭挫折,他的人生信念是在困顿境遇中产生并逐渐充实的。"致君尧舜上"的志向,是在"骑驴十三载,旅食京华春。朝扣富儿门,暮随肥马尘。残杯与冷炙,到处潜悲辛"的境遇中提出来的。"窃比稷与契"之句的下文,即是"居然成濩落,白首甘契阔"。对于浅薄浮躁的人,艰难困苦会使之放弃理想的抱负。对于沉稳坚毅的人,艰难困苦反而会激发其志气,坚定其决心。杜甫显然是后一种人。他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非常悲惨,常常陷于饥寒交迫的境地。在那种时刻,杜甫难免会啼饥号寒,把谋求温饱视为当务之急:"无食问乐土,无衣思南州。"(《发秦州》)他甚至说过"但使残年喫饱饭,只愿无事长相见"(《病后过王倚饮醉歌》)之类的丧气话。但杜甫对理想仅是暂时的搁置,而不是永久的抛弃,理想的火焰依然在他心头燃烧,一有机会仍会放出光芒。在他去世的前一年,杜甫对友人说:"致君尧舜付公等,早据要路思捐躯!"(《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》)一个快要走到人生终点的人还把"致君尧舜"的理想谆谆托付给友人,说明他对心中的理想是何等的珍视和坚持。

二

在儒学的发展史上,曾出现两个高潮,它们分别在汉代和宋代,所以儒学的两大流派分别被称为"汉学"与"宋学"。儒学史上的唐代夹在这两个高潮之间,实际上处于一个低潮阶段。那么唐代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儒学代表人物?当然有,其中之一就是杜甫。钱穆在《中国史学发微》中称杜甫为唐代的"醇儒",非常准确。杜甫不是儒学经典的注疏者,他对儒学的服膺主要体现于实践,他身体力行地将儒学原则付诸行动,从而在儒学发展史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。不但如此,杜甫还用他一生的实践、行为,用他的整个生命,来丰富、充实儒学的内涵。

儒学千头万绪,其核心内容就是仁爱思想,主张在天下推行以仁爱之心为出发点的仁政。 儒家认为一切的爱心都是从人们的内心自然生发出来的,孟子说:"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"(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)这是一种由近及远、由亲及疏的自然的情感流动。由这样的程序生发出来的仁爱之心,它更自然,更符合人的本性,也更切实可行。杜甫对儒家的这个核心精神心领神会,他的诗篇,他的行为,时时刻刻都在阐释这种理念。杜甫感情深厚诚笃,被近人梁启超誉为"情圣"(《情圣杜甫》)。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妻子、儿女和弟妹,一生中始终与妻儿不离不弃,相依为命。他与杨氏夫人伉俪情深,白头偕老。当他陷贼长安时,曾对着月亮怀念远在鄜州的妻子:"何时倚虚幌,双照泪痕干?"(《月夜》)当他与家人隔绝时,就格外思念幼小的孩子:"世乱怜渠小,家贫仰母慈。"(《遣兴》)杜甫对友人情同兄弟,时时见于吟咏。他四十八岁那年流寓秦州,全家生计濒于绝境,却在短短三个月内写了三首思念李白的名篇,至性至情,感人肺腑。杜甫还将仁爱之心推广到素不相识的天下苍生。当杜甫到奉先县去探亲的时候,突然发现自己的幼子已因挨饿而夭折了。他当然悲痛万分,但马上联想到了普天下还有很多比他更困苦的人:"抚迹犹酸辛,平人固骚屑。默思失业徒,因念远戍卒。"(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)在一个秋风秋雨之夜,杜甫屋漏床湿,彻夜不得安眠,此时此刻,他想到的是"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,风雨不动安如山!呜呼,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,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!"(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)杜甫的思考过程,他的感情流向,也是由近及远,由亲及疏,这分明是"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"的儒家精神的具体阐发。

儒家仁爱之心的最高体现形式是实行仁政,杜甫对此完全赞同,他用诗歌表示了这样的希望:"牛尽耕,蚕亦成,不劳烈士泪滂沱,男谷女丝行复歌。"(《蚕谷行》)他满心希望朝廷薄赋轻徭,让人民休养生息:"借问悬车守,何如俭德临?"(《提封》)他谴责急征暴敛:"彤庭所分帛,本自寒女出。鞭挞其夫家,聚敛贡城阙。"(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)在国家统一不受损害的前提下,杜甫坚决主张息兵罢战。他作《兵车行》揭露朝廷的穷兵黩武,以及无辜百姓埋骨荒外的悲惨命运:"君不见青海头,古来白骨无人收。新鬼烦冤旧鬼哭,天阴雨湿声啾啾!"儒家总是对危害仁政的现象忧心忡忡,杜甫的忧患感与孔、孟一脉相承,他"穷年忧黎元,叹息肠内热"(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),他"向来忧国泪,寂寞洒衣巾"(《谒先主庙》)。时时刻刻都在忧国忧民的人必然会对社会的黑暗面怀有最强的敏感,必然会对国家的隐患保持最强的警惕。杜甫最为忧心忡忡的是社会的贫富悬殊。他写出了惊心动魄的名句:"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!"(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)这是杜甫深沉忧患意识的生动体现,是杜甫向千秋万代发出的严重警告。

杜甫对儒家的仁爱思想有所发展、补充。孔、孟等早期儒家提出的仁爱之心,其思考对象是人类,"樊迟问仁,子曰:'爱人。'"(《论语·颜渊》) 孟子则举例说明人们的仁爱之心的来源:"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,皆有怵惕恻隐之心。"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爱人之心也好,恻隐之心也好,它的关注对象都是人,没有包括其他生命。杜甫则将爱人之心延伸出去,推广开来,用更加广博的仁爱精神去拥抱整个世界。杜诗写到天地间的一切生灵都出以充满爱抚的笔触:"筑场怜穴蚁,拾穗许村童。"(《暂住白帝复还东屯》)"盘飧老夫食,分减及溪鱼。"(《秋野五首》之一)在杜甫心目中,天地间的动物、植物都与人一样,应该沐浴在仁爱的氛围中。杜甫尤其关心那些处境欠佳的动植物:"白鱼困密网,黄鸟喧佳音。物微限通塞,恻隐仁者心。"(《过津口》)杜诗中写到动物、植物,往往有比兴寄托的意味,但是也有许多并无寄托,例如《舟前小鹅儿》:"鹅儿黄似酒,对酒爱新鹅。……客散层城暮,狐狸奈若何!"充溢在字里行间的只是对弱小生命的由衷爱怜和关切。杜甫关爱一切生命的情怀是对儒家仁爱思想的重要发展,因为把仁爱之心从人推广到普通的生物,本来是儒学内在的一种发展方向。"民胞物与"的命题,在理论上要等到宋人张载才阐发出来,但是在文学上,它早在杜诗中就得到生动的弘扬,这是杜甫对于儒学思想的一大贡献。

三

在中国文学史上,没有哪位文学家的作品拥有像杜诗那么多的注本。自从南宋出现《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》等注本后,"千家注杜"的说法便广为流传了。虽说黄氏往本中实收注家仅有151人,但自宋迄今,杜诗的注家、选家及研究者确已超过千人,成为文学史上罕见的壮观。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,当然不需要读那么多的注本。但如果您想了解到底有哪些有关杜甫的著作的话,也不妨去翻检周采泉《杜集书录》和郑庆笃《杜集书目提要》这两种有关杜诗的目录学著作,它们对自宋迄今有关杜诗的著作有相当详尽的介绍。

如果读者朋友想要比较全面地了解杜甫,当然应该阅读杜甫全集。对杜诗的整理与注解都是从宋代开始的,如果你想了解杜诗注释和研究的历史过程,那么可以读几种重要的宋代注本,例如赵次公的《杜诗先后解》、郭知达的《九家集注杜诗》、蔡梦弼的《杜工部草堂诗笺》、黄希、黄鹤的《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》、刘辰翁评点的《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》等,它们为杜诗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,是后代所有杜诗注本的学术源头。

然而学术总是后来居上的,杜诗学也是如此。从总体上看,清代杜诗注释的水平已经超越宋注。如果如果限于时间和精力,您暂时只能阅读一种杜诗全集注本,那么我们建议您从下列清代注本上选择其一。

一是杨伦的《杜诗镜铨》。这是最为晚出的杜诗清注本,初刻于清乾隆五十六年(1791)。它的特点一是参酌众本之长,又出之以简明扼要,一立论则平正通达,一是最适于一般读者的杜诗全注本。如果你只想用较少的时间来通读一遍杜诗,这是最合宜的一种。

二是浦起龙的《读杜心解》。此本初刻于清雍正三年(1725)。它的特点是注释比较简明,不作繁琐的征引和考证,其长处在于解说,尤其是在分析段意方面,颇能提纲挈领,有时还对杜甫的写作意旨有所发明。但是评说章法时染有八股陋习,编次也不够完善。

三是仇兆鳌的《杜诗详注》。这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杜诗注本,初刻于清康熙五十二年(1713)。它的特点就是一个"详"字,几乎可以视作对康熙以前各种注本的集注,对唐宋以来的各种笔记、诗话也收罗甚丰。仇注的篇幅很大,读它需要较多时间。但读此一本等于读了许多注本,所以还是值得一读的。他的缺点是繁琐,一字一句皆求出处,分析也嫌琐碎。读此书时可以参阅清末施鸿保的《读杜诗说》,它是专门纠正仇注之失的。

四是钱谦益的《钱注杜诗》。此本初刻于清康熙六年(1667),它的特点是注重以史证诗,对杜诗的时代背景有比较确凿的阐明。它的注释以简洁为尚,仅录杜诗白文不加注释的达五百多首。此本的学术价值较高,但对初学者用处不大,如果你想较深入地了解杜诗与唐代史实的关系,则可以参阅。

五是王嗣奭的《杜臆》。此书不录杜诗原文,也不对杜诗逐句作注,它的特点是用"以意逆志"之法对杜诗的思想内涵进行评说,颇有精到的见解。王嗣奭是明代遗民,入清后拒不降清,对杜甫的人格意义有很深的理解。如果你想侧重理解杜甫的为人和杜诗的思想内涵,可以参阅此书。

有史以来最称完备的杜诗注本当然是萧涤非先生主编、张忠纲先生终审统稿的《杜甫全集校注》。此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,堪称杜诗注释的集大成之作。该书的校注工作始于1978年,终于2012年,前后经历三十五个春秋,待到全书杀青付梓,主编萧先生已不在人世。《杜甫全集校注》带有集校、集注、集评的性质,其参考资料包括存世的所有杜诗注本以及有价值的杜诗研究论著,代表着杜诗注释的最高水平,也是当代杜诗研究最重要的成果。可惜该书卷帙浩繁,篇幅达660万字,恐非一般读者所能通读。如果读者朋友对某首杜诗有所疑难要想深入探究,则此书是最合适的查阅对象。

当我们接受商务印书馆的约请,重新编选一本《杜甫诗选》时,有多种杜诗选本早已问世。其中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的《杜甫诗选》和邓魁英、聂石樵选注的《杜甫选集》,所选篇目数量适中,注释则简明扼要,对一般的读者很有帮助,也是我们常置案头的杜诗读本。既然如此,我们为何还要编选一本新的杜诗选本呢?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热爱杜甫,我们希望通过编选本书向杜甫献上一瓣心香。一座庙宇可以接纳众多的香客,无论他们是先来还是后到,也无论他们贡献的香火是多是少,都有资格在神像前顶礼膜拜。同理,无论别人已经编选了多么优秀的杜诗选本,都不会妨碍我们的重新编选,况且我们对杜甫和杜诗持有自己的观点,我们的编选工作不是跟在前辈后面的亦步亦趋。比如选目,本书与上述两种杜诗选本有较大的差异。但我们的选目是直接从杜甫全集中选择的,并未参照或刻意回避其他杜诗选本。全书完稿后,我们对三种杜诗选本的选目进行统计比较,发现山东大学选本所选的144诗题中,有37题未选入本书,差异率达四分之一强。邓魁英、聂石樵选本所选的226题中,有67题未选入本书,差异率达十分之三。反过来,在本书所选的190题中,有55题未曾选入上述二书的任何一种,新增率达十分之三弱。总之,本书所选的190题、255首杜诗,就是我们心目中的杜诗代表作。其中有些作品或因思想倾向的因素长期不被现代选家重视,例如《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》《哀王孙》;有些作品或因诗体、风格的因素而被忽视,例如七排《题郑十八著作丈》、五古《火》,现在一并选入本书,我们希望它们能得到读者的重视。至于本书的注释和评析,则力求简洁,不求详尽。其中引用的前人之言,概据《杜甫全集校注》,不再注明出处。

衷心希望读者朋友喜爱这本《杜甫诗选》,衷心希望大家对本书的错误和缺点进行指正。

(本文为《杜甫诗选》导言节选,原文一万一千余字。《杜甫诗选》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)

编辑手记

刘尚慈先生与《公羊义疏》的点校整理

■石 玉

《公羊义疏》点校整理本终于出版了!

与《左传》、《穀梁传》并列为《春秋》三传的《公羊传》,是一部阐发和解释《春秋》"微言大义"的典籍,皮锡瑞认为"《春秋》为后世立法,唯《公羊》能发明斯义"(《经学通论》),即认为《公羊传》独得孔子真传,其所解释最接近《春秋》经义。汉代统治者为了稳固封建大一统政权,曾一度极为推崇今文经学,以阐发经义、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为旨归的公羊之学受到重视。自汉代"五经"始,直至宋代以后的"十三经",《公羊传》虽然始终被列为儒家经典,但对它的研究却经历了长时间萧条沉寂,甚至乏人问津,直至清代中晚期,才涌现了一批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,陈立(1809—1869)的《公羊义疏》是其中的佼佼者。陈立曾从梅植之、凌曙、刘文淇等名师学习,精通经史小学,于公羊学用功尤深,所著《公羊义疏》吸收前人训释成果,为集大成式的作品。1982年,中华书局规划"十三经清人注疏"丛书时,将该书纳入了出版计划。遗憾的是,由于公羊学专业性太强,点校难度太大,我们一直没有约请到合适的整理者来董理此事,以至延宕三十多年之久,才于2017年11月推出了点校整理本。

《公羊义疏》的点校者是刘尚慈先生。刘先生退休前一直供职于中华书局语言文字编辑室,《王力古汉语字典》即由她责编。刘先生是中华书局老一辈学者型编辑的典型代表,她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,在学术研究尤其是文献整理领域取得了不凡成就。说起来,我与刘先生都供职于中华书局,但我入职晚,在工作上与她并没有任何交集,知道"刘尚慈"这个名字,就是2010年我所在的哲学编辑室出版了她的《春秋公羊传译注》。也正因为《春秋公羊传译注》的成功出版,《公羊义疏》的点校整理大任最后落到了刘先生的头上。基于她对古籍整理体例的熟稔以及对公羊学的深入研究,刘先生用了两年多时间,就将七十六卷近二百万字的《公羊义疏》点校稿交给了我们。

《公羊义疏》篇幅长,难度大,无论是点校整理还是编校加工,都很难在短期内一鼓作气完成,为了提高效率,我们决定将七十六卷书稿按每十卷为一个单元排版、编校,即所谓的"滚动"式推进。随着编辑工作的渐次展开,取稿、送稿、沟通问题等等日渐频繁,与刘先生接触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了。我知道她平常一般都是工作到很晚才睡,为了不影响她早上休息,通常情况下,我会选在下午两点左右到达刘先生家。落座后,刘先生会问我喝红茶(她知道我肠胃不太好,不宜喝绿茶或咖啡)还是白开水,天气很热时会取来一瓶饮料,或切个西瓜,她的热情周到让我如沐春风。因为我与刘先生同是书局编辑,故而绝无作者与编辑之间因角色不同而容易产生的隔膜。我们一起谈论书稿体例方面的问题、断句标点问题、版式问题、编辑加工时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等等,交流起来很顺畅。

《公羊义疏》是集释性质的著作,在考证训释过程中陈立极力吸纳前人的研究成果,从而造成书中的引文异常繁复驳杂,且多数引文或明确了作者,而没有给出书名,或者给出了书名的简称;有的只出书名全称或简称而不出作者名,而经学史中同名的古籍大有所在。麻烦的是,在这样的情形下,将书中出现的典籍引文,与原始文本做复核工作会非常困难。引文中很多是有书名不具篇章名,这类情况还好办,难办的是只有篇章名而无书名,这需要点校者具备何等的腹笥!多亏如今有电子文库。但即便如此,一一查检起来,仍需要有极大的耐心和毅力。最开始见到刘先生交来的样稿时,编辑室认识到其难度,建议简便处理,引文统一不加引号,这样做,可以避免误判引文终止位置而造成错误,可以不必理会原书引文文字不准确这一令人头疼的难题,点校起来会容易很多。刘先生觉得不妥,她认为,如果解决不了该书的引书问题,点校本会大减其色,大减其用,她说:"如果是这样,我就不如不做了。"她不辞辛苦,力主做得精细,我们自然乐见其成。事实上,复核引文工作之巨、难度之大,我想恐怕超出了她的预期。如今,当读者打开《公羊义疏》点校本时,便会发现基本上每面都列有校勘记,多数校勘记都是针对引文而发。在复核引文的过程中,刘先生专门准备了一个文档,考证并记录引用书籍的文献资料,汇总下来竟有十多万字。有些文献,刘先生手头没有,会让我查一下书局图书馆,有的话帮她借用一下,有时我也会从网上下载一些刻本传给她。在书稿即将付型时,刘先生仍不无遗憾地说,有几处引文,实在无从查起,姑且按照自己的理解做了整理,很不放心。

在对待引文这种大的问题上如此,在一些细小问题上亦是不容马虎。比如在夷、狄等少数民族名称是否加专名线的问题上,刘先生区分得非常清楚。通常,我们是将这些名词作为泛称不加专名线,而刘先生则认为,应该区分特指和泛指,凡《春秋》经传中出现的,一般是特指某个地区的少数民族族群,需要加专名线,而陈立义疏中出现的,两种情况皆有。又如书中的按语,我们习惯上在"按"字(另有案、今按、今案等)之后加冒号,而刘先生则认为引文中有"按",引文外陈立还有他的按语,"陈立的按语或是他对各种说法的总结归纳,或是对所引述观点的肯定或否定,或是一些补充内容,一般是陈立带有总结性的意见"(见《公羊义疏·点校前言》),因此,如果一律用相同的标点,不易区分哪些是陈立的按语,哪些是陈立引书原文的按语,不能突出陈立的态度和观点,故而建议,凡是属于陈立的按语,用冒号断句,属于其他人的按语,则用逗号断句。诸如此类问题,她都有自己的处理办法。

《公羊义疏》(全六册),[清]陈立撰,刘尚慈整理,中华书局2017年11月第一版,298.00元

按照正常进度,《公羊义疏》于2016年8月份即完成三校和编辑审读,达到了付型要求,但结合校对提出的一些问题,我和刘先生都觉得有必要再将书稿从头至尾仔细审读一过,于是又分别看了一遍,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留下硬伤。事实证明,虽然这遍审读耗费了很大精力,使出版时间推迟了一年有余,但切实解决了不少断句标点问题及体例不统一问题,是极有必要的。

即便如此,刘先生仍不能完全放心。当拿到送检样书时,我在第一时间给先生打去电话汇报情况,正值她抱恙,没有过多寒暄,她开门见山地问我检查样书时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。不久后我送去作者样书,闲聊时,她仍十分诚恳地说,这么大部头的书,里面的问题肯定不少,希望读者发现后能够及时反馈,帮助提高。